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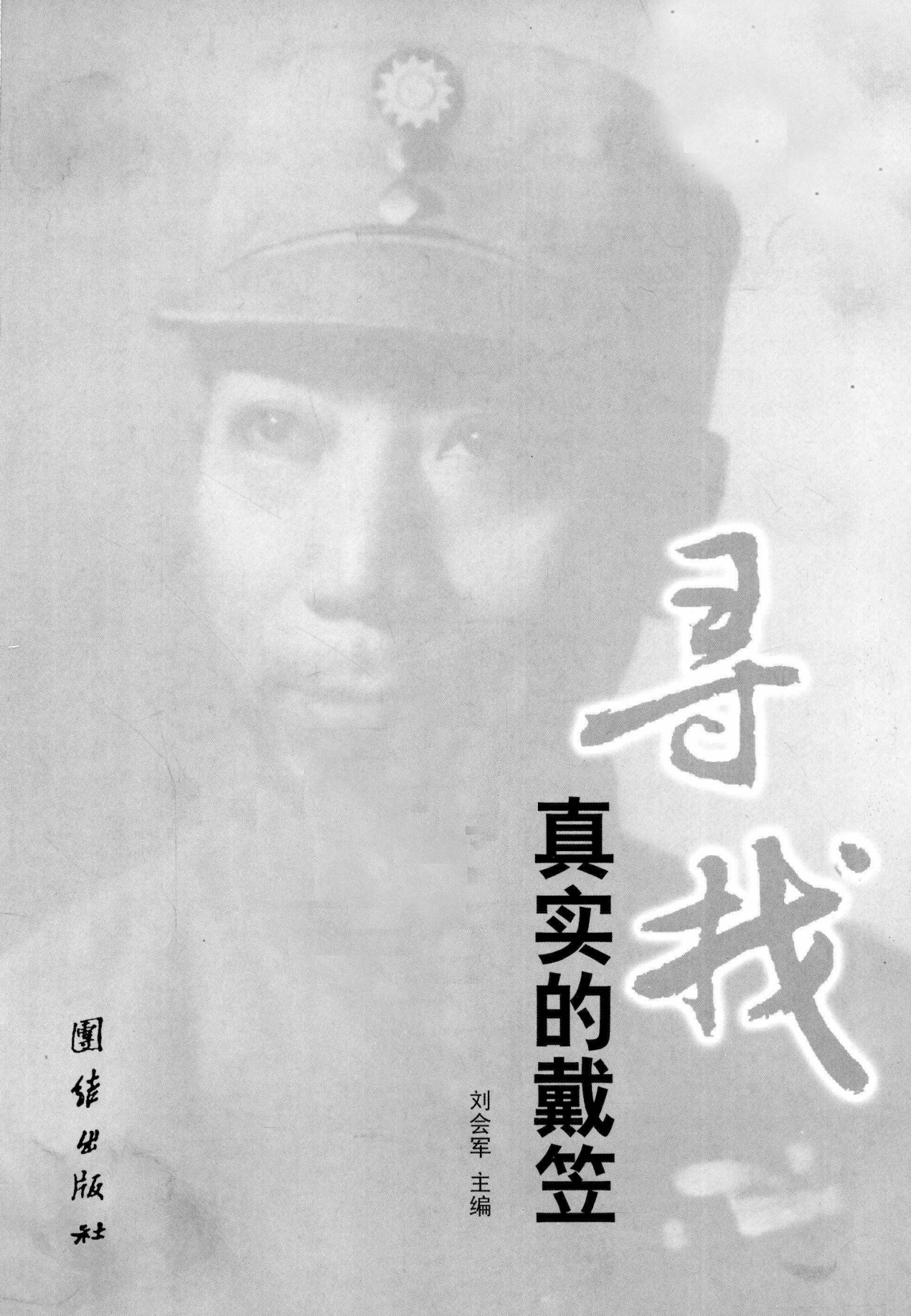
有人说他阴鸷，有人说他豪义，有人说他风流，有人说他残忍，就连他的死因，到现在还是扑朔迷离，充满神秘色彩。让我们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揭示一个真实的戴笠。

哥我

真实的戴笠

刘会军 主编

团结出版社



寻找

真实的戴笠

刘会军 主编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寻找真实的戴笠 / 刘会军主编.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0. 7

ISBN 978 - 7 - 5126 - 0176 - 5

I. ①寻… II. ①刘… III. ①戴笠(1897 ~ 1946)—人物研究 IV. ①K827 =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29801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出版社)

(010) 65238766 85113874 65133603 (发行部)

(010) 85113694 (邮购)

网 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出版社) 65228880@163.com (投稿)

65133603@163.com (购书)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70 × 240 毫米 1/16

印 张: 22

字 数: 445 千字

印 数: 8000

版 次: 2011 年 1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26 - 0176 - 5/K · 58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属, 盗版必究)

目 录

引言：戴笠到底是怎么死的	1
戴笠之死的 N 种说法	1
戴笠的困境与死前行踪	4
戴笠不是死于谋杀	13
从飞机失事的报道寻找戴笠死亡的真相	15
蒋介石为什么隆重公祭戴笠	19
一、扑朔迷离戴春风	23
戴笠生父原本姓郑	23
寡母严慈育幼子	25
少年失学	26
二、黄埔六期的“包打听”	31
戴笠投考黄埔军校	31
从戴春风到戴笠	33
清党中的“特殊贡献”	34
没有毕业的黄埔六期生	36
三、从单打独斗到组织活动	39
拦车上书走上特务路	39
加入“十人团”	42
四、蒋介石、戴笠与法西斯主义	47
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的泛滥	47
力行社、复兴社、蓝衣社	50
戴笠当上特务处处长	56
蒋介石为什么用戴笠	58
南昌行营调查课并入特务处	63

寻找真实的戴笠

戴笠的特务理论 68

蒋介石的忠诚死士 74

五、蒋介石的黑手 78

 杨杏佛喋血 78

 沪杭路上的血案 82

 王亚樵之死 88

 计擒韩复榘 95

 诱捕杨虎城 102

 斧砍唐绍仪 109

六、军统大膨胀 120

 麾下第一支特务武装 120

 戴笠死后当局长 124

 遍地开花的训练班 130

七、戴笠的权势到底有多大 139

 特务触角无处不在 139

 以帮会控制帮会 145

 官场中的纵横捭阖 150

 对中统的打压 154

八、中美合作所真相 161

 从“中国黑室”到中英、中美合作所 161

 中美合作的内幕因缘 165

 抗日情报机构还是反共特务组织 168

 中美合作所的终结 176

九、对日间谍战 182

 大批日谍来华 182

 谍战上海滩 185

 天字第一号间谍案 191

 密电疑云 194

十、汪精卫与戴笠 200

 出逃也与军统有关 200

汪精卫为什么当汉奸	201
从河内开始的刺汪行动	206
最后之死也与戴笠有关	213
十一、戴笠与周佛海	217
反复无常周佛海	217
大汉奸的妙用	226
周佛海不死之谜	229
十二、杀敌除奸	236
王克敏、张敬尧难逃一死	236
陈策死在除夕	240
陈明楚、何行健、张啸林	244
从忠仆到凶手	247
丁默邨色而不戒	253
十三、活跃在敌后的军统	256
游击武力	256
敌后大破坏	261
十四、策反、运用与肃奸	266
对伪军的策反与运用	266
接收还是“劫收”	272
一枪不响抓汉奸	275
十五、反共尖兵	280
假如戴笠不死	280
扑不灭的火焰	282
打入延安的军统与打入军统的中共	288
暗杀手段	294
反共大手笔	298
十六、戴笠的权术与政治敏感	304
交往以利不以义	304
同志即手足，团体即家庭	307
胜于常人的政治敏感	313

寻找真实的戴笠

十七、戴笠与女人	318
戴笠到底有多少女人	318
人人都想做“老板娘”	323
情迷影后戴公梦蝶	326
十八、戴笠的残暴	330
一手建立的监狱系统	330
五花八门的酷刑	334
十九、戴笠身后事	338
戴氏死后的军统内斗	338
戴笠独子之死	340
戴笠后人今何在	344
毛泽东说：戴笠墓毁掉真可惜	346

引言：戴笠到底是怎么死的

戴笠之死的 N 种说法

1946 年 3 月 17 日上午 11 时 45 分，青岛沧口机场，天气阴沉，烟雨迷茫，一架 C-47 型军用运输机冲天而起，飞往上海方向。这就是戴笠乘坐的 222 号专机。

其时上海大雨滂沱，无法降落。下午 1 时 6 分，南京航空委员会收到专机电告：“谓已到达南京上空，与上海联络不上，气候恶劣，不能下降，折回青岛，少顷复电告北平：谓已到达南京上空，气候恶劣，旋又电称：现穿云下降，时在 13 时 13 分。”“在此以后，消息即告中断，京、沪、平、津各机场，皆不知其下落。南京机场判断飞机已遇险，立即通知航空委员会。”

“当天下午 4 时，军统局上海办事处，见戴氏座机，逾时尚未到达，即向南京查询，南京办事处，又转询汉口机场，皆无音耗。于是急电重庆，洽请美空军派机沿途寻找。”“当晚由航委会及中航公司与美海军方面，分别派机，沿途搜索，均未发现。”

戴笠的 222 号专机去向不明。

每次戴笠出差，军统局本部都由主任秘书毛人凤衔戴笠命主持。毛人凤这时接到报告后，一方面令军统局电讯总台的二十多部电台全部开放，搜索专机电讯，一方面急电有关地方的军统组织查询，仍是音讯不明。

18 日早晨，毛人凤跑到蒋介石官邸报告。蒋即命毛人凤派人乘专机查找，指令“一定要把戴笠科长找回来”。毛人凤回到军统局后，经过讨论，决定安排军统局总务处处长沈醉带人乘飞机寻找，并带沈醉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在印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手令”的信笺上写下：“无论何人，不许伤害戴笠，各军政机关、地方政府，如发现戴笠，应负责妥为护送出境。此令。蒋中正”交给沈醉。沈醉等尚未出发，南京方面即传来了发现失事飞机的有关消息。

关于失事飞机的发现过程主要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来自《戴雨农先生全集》。戴笠死后，他所主持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到台湾后又改组为“国防部”情报

寻找真实的戴笠

局。1979年，这个局整理出版了这本书。其中的《殉难详情》记载道：“20日下午由美空军机在南京板桥镇附近20华里之山上，发现该机残骸，军统局驻京人员闻讯，驰赴戴山，见机身已全部焚毁……”

另一种说法来自良雄所著《戴笠传》。该书写道：“由军统局南京办事处主任刘启瑞所率领的一路人，冒着风雨，寻至江宁板桥，询问乡民，据告17日午后，曾闻附近山间的爆炸声，乃请为向导，进入山区。入山不久，即望见有飞机残骸。”根据刘启瑞的回忆判断，这是3月19日傍晚。

不管是哪种说法，都是在沈醉未出发前，就发现了失事飞机。在飞机失事地点，“发现地上有一手枪，乃戴氏所常佩用者。其旁另有一印章，分明为其随员龚仙舫私章。随即见到十余具尸体。至此，戴氏遇难，已无可疑。”“其能辨识者，则仅戴氏一人，因其假牙位置相符。”和戴笠同机烧死的，还有其随员七人等，他们是：

姓 名	年 龄	籍 贯	出 身	生前职务
龚仙舫	38	湖南石门	中央军校六期	军统局人事处处长
金玉坡	52	安徽阜阳	将校研究所	军统局专员
马佩衡	44	江苏上海	香港大学文学士	翻译官
周在鸿	20	浙江江山	衢州八中	译电员
徐 桑	29	浙江永嘉	中央军校十七期	副官
曹纪华	28	江苏无锡		卫士
何启义	30	安徽无为		卫士
黄顺伯		河北天津		戴笠友人

戴笠是个神秘人物，不仅在生前神秘，死后也被赋以同样的神秘。有人说他并没有死，有人虽然承认他已经死了，但又对其死因生出多种不同的说法。

《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的作者魏斐德教授在提到此事时写道：“但更为普遍的说法是，那天戴笠根本就没有上那架飞机，而是假造了自己的死来挫败他的敌人。”他引用了莱司特·沃克（Lester Walker）在《哈珀斯》杂志（Harper's）上的撰文，以说明此种说法的由来。莱司特描写戴笠的死时写道：“这个故事天衣无缝，但没人想到新闻简报是4月1日发出的，也就是愚人节。那天你只要问任何一个中国人他今天的看法，他只会笑，说‘这不可能’，也就是说，中国人认为这不可能，相反，他们相信，这位世界上最大的‘间谍王’仍在享受着迷人的生活，而不可能被杀死。”但莱司特的说法不过是用西方的观念来判断中国人，他不知道当时的中国人没有愚人节这个概念，这种判断是不可能正确的。魏斐德教授肯定了戴笠之死后，引用了沈醉对胡宗南说的话：“我们告诉他，经过多方调查，证实没有什么人对他进行谋害，的确是由

于气候关系，驾驶员不慎撞在山上失事。”

就在魏斐德教授确认了戴笠是因飞机失事而死的时候，在中国却在大肆渲染戴笠被谋杀的多种传言。

第一种说法出自北京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唐人（严庆澍）所著《金陵春梦》。该书提到，陈果夫在蒋介石面前说戴笠在军统局内部搞个人崇拜，“视主席若无物，野心如何也可想而知了”。戴笠还在接收中大发横财，“他们在杜公馆开会，每一个干部有新汽车”。“蒋介石听陈果夫说了个够，又找其他亲信个别盘问对戴雨农的看法。说也奇怪，竟没有一句好话。因此蒋介石更感到戴笠在这几年中委实跋扈，但如今已尾大不掉，很难对付了”。“蒋经国的亲信更有这么一种暗示，如不除戴，将来‘大太子’都抬不起头来，遑论‘二太子’蒋纬国了”。以至于使蒋介石“几乎食不知味，寝不安枕，想尽办法如何拔掉这颗眼中钉”。蒋介石问起蒋经国戴笠的实力时，蒋经国说其特种部队“人数在20万到30万左右，一律从中美合作所梅乐斯那边转移而来。卡宾、汤姆生火力极强，如果同我们的军队来比较，约一与五之比”。蒋介石说：“那还了得！这样说起来，他的30万，不就要对付我们100万人吗？”于是，下定决心除掉戴笠，由陈果夫安排一个在美国学过飞机驾驶的飞行员为戴笠驾驶专机。在1946年3月17日，这一飞行员驾驶飞机撞向山头，与戴笠同归于尽。

第二种说法是马汉三和刘玉珠谋杀说，起源于香港的《广角镜》杂志。1988年10月16日，该杂志发表署名华永正的文章《揭开戴笠坠机之谜》。文章披露，军统局北平办事处主任马汉三因为贪污了接收中的大量财物，特别是一把乾隆的宝剑，怕戴笠日后加罪，于是派其心腹刘玉珠在青岛把炸弹放在戴笠的专机上，飞机在南京上空发生爆炸，戴笠也被炸死。自此，这种说法开始流行，并成为主要说法，以至于各种书刊竞相沿用，并且情节越来越细，越来越周全。有人说这把宝剑本是孙殿英盗乾隆墓时所得，1939年戴笠到河南时，孙殿英送给他，上边有九条紫金龙，被称作龙泉宝剑。戴笠把剑交给部下马汉三，让他想法送往重庆，交给何应钦，再由戴笠交给蒋介石。不料马汉三并没有将此剑送走，而是自己收了起来。后来，马汉三在张家口被日本特务田中隆吉逮捕，为保命，把此剑献出，并供出军统局的组织。后田中隆吉把此剑交给川岛芳子。日本投降后，川岛芳子被捕，时为军统局北平办事处主任、平津地区肃奸委员会主任的马汉三又把此剑搜出。戴笠到北平后，亲自提审了川岛芳子，得知了此剑的下落和马汉三曾被捕一事。由此，马汉三决定动手杀死戴笠，以绝后患。为了增加事情的可信度，有人说刘玉珠以军统局华北督导员的身份而登机检查，没人阻挡；有人说刘玉珠以其美貌迷惑戴笠等。总之，是阴谋得逞，炸死戴笠。

第三种说法则认为，戴笠和不久前被释放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乘同一架飞机。在飞行途中，叶挺和戴笠争执起来，各自拔出了手枪，随即而起的射击

寻找真实的戴笠

导致飞机着火。

第四种说法称飞机坠毁是共产党的破坏。

第五种说法则认为美国战略情报局在飞机上安置了炸弹。其原因是日本投降后，戴笠要对过去所有与日本人合作过的中国人进行一场屠杀清洗，美国战略情报局探听到这个消息后，所有的人都认为，必须制止这场大屠杀行动。于是得到戴笠将在青岛住夜的情报后，迅速指示美国特工秘密在戴笠乘坐的专机气压计的保险丝上做了手脚，调成在 5000 英尺的高度上爆炸。

甚至还有第六种说法说戴笠是自己拔枪打死座机驾驶员而坠机自杀的。也有说法认为戴笠是被李士珍害死的。

戴笠肯定是死了，这没有什么疑问，从国民政府的褒扬令，从蒋介石亲自为他主祭，选择墓地，各地的悼念活动都可以证实。但他究竟是怎么死的？和叶挺对射之说是十分荒诞的，因为人们都知道他们俩不是乘同一架飞机。戴笠的飞机是 1946 年 3 月 17 日撞在南京附近江宁县板桥镇的戴山上，叶挺的飞机是 1946 年 4 月 8 日撞在山西省的黑茶山上。其他说法都是望风捕影的，只有蒋介石杀死说和刘玉珠炸死说影响较大，信的人较多，而且越说越具体。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说法一一进行剖析。

戴笠的困境与死前行踪

许多文章和著作说到戴笠之死时，都将之与抗日战争结束前后的政治形势和政治格局联系到一起，说军统局和戴笠都走到了尽头，蒋介石要取消特务组织，也有的说蒋介石已经授命蒋经国建立了新的特务组织建国社，并按戴季陶的建议命李士珍接手戴笠的军统局。《金陵春梦》还说是蒋介石怕戴笠的军统局已经尾大不掉，威胁到了蒋介石的统治。于是蒋与陈果夫密谋，选择死士做戴笠专机的驾驶员，故意撞到山上，与戴笠同归于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需要查明真相。

抗日战争结束后，军统局和戴笠确实一度陷于困境。这要从头说起。

1945 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8 月，美国先后在日本的广岛、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苏联红军分兵四路，向中国的东部、北部、西部和朝鲜北部的日军发动大规模进攻。日本帝国主义面临灭顶之灾。8 月 15 日，日本天皇颁布停战诏书，宣布投降。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民族的伟大胜利。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民族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各抗日党派和全中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政治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共两党之间不存在矛盾。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一直存在，有时还非常尖锐。抗日战争结束之际，关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又摆在国共两

党、各民主党派和全中国人民面前。由于国际形势和国内人民的呼声，国共两党开始探索通过谈判解决矛盾，实现和平建国。

8月14日，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致电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未寒

1945年8月14日

20日、23日，蒋介石又连电延安，促毛泽东到重庆谈判。

面对此种形势，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关于“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的主张。8月24日，毛泽东电复蒋介石：

特急，重庆

蒋介石先生勋鉴：

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毛泽东敬

1945年8月24日

28日，毛泽东在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国民政府特使张治中将军的陪同下，与周恩来等人同机抵达国民政府的战时陪都重庆，开始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重庆谈判。

1945年10月10日，重庆谈判双方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1946年1月，由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各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中国有望走入和平建国的道路。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和戴笠遭遇了困境。

戴笠的特务组织自成立后就遭到社会各方面的反对。1933年，宋庆龄等人组建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就是针对特务横行，人民的人身安全和自由得不到保障而出现的。杨杏佛、史量才等人被戴笠暗杀后，社会上曾经明确提出过取消特务组织的呼声。抗日战争爆发后，戴笠的特务组织改组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其组织迅速膨胀，人员增加，权势加大，活动范围广泛，成为无孔不入的特务组织，已经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生活。抗日战争胜利后，在社会上和

寻找真实的戴笠

平民主的呼声中，戴笠的特务组织又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及一切爱好民主自由的人士，无不提出要取消特务组织，以保证和平建国、民主政治方针的实现。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方面签订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中第四条明确规定：“关于人民自由问题，一致认为政府应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第六条规定：“关于特务机关问题，双方同意政府应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之权。”第七条：“关于释放政治犯问题，中共方面提出：除汉奸以外之政治犯，政府应一律释放。政府方面表示：政府准备自动办理，中共可将应释放之人提出名单。”1945年12月《周恩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讲话和答记者问》中，明确提出要“废除特务机关”。1945年8月15日《中国民主同盟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中提出：“我们主张政府以明令重申保障人民的一切基本自由，包括各党各派的公开活动，并废止一切在战时不得已妨碍人民一切基本自由的法令与机构，包括特务、劳动营，以及一切束缚言论出版的检查条例。”民主建国会向政治协商会议提供的初步意见中，第一条就是“开会以前”，“内战必先停止，人民身体、信仰、言论、出版、结社、集会、通信等基本自由先全部赋予，释放政治犯，政党合法化，和特务机构的解散，必先全部实现。”“人民各种基本自由的赋予，政治犯的释放，政党的合法化和特务机构的解散，是政治走向民主开明的最起码的表现。这些连战败国的日本人民，都已经从麦克阿瑟元帅的手里取得了。我国民八年以来，不恤牺牲，戮力抗战，现在得到胜利，难道还应该比战败国的人民都不如吗？这是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的。”柳亚子在1945年9月25日提出的《解决国是问题的最后方案》中，更明确指出要“彻底取消中统、军统以及其他全国的特务机关”。施复亮在《我的答案》中也提出“必须彻底解散一切特务组织，停止一切特务活动”。《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提出和平建国纲领草案》更进一步指出：“政府应保障全国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在平时应享受之身体、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居住、迁移、营业、罢工、游行示威及免于贫困、免于恐怖等自由。”“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之权。所有侵害人民权利的一切特殊机构，应即解散。”“一切政府机关与军政人员，凡有侵犯上述人民自由之行为者，应予以处罚。”以上言论的目的不仅是要取消特务机构，而且要废止一切有形的、无形的特务活动。

重庆谈判和政协会议前后，全国各界一致期盼实现民主和平，国共两党也曾一度认为和平建国很可能实现，连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在给中国共产党重庆谈判代表的电文中，都提出了要保留苏北解放区，以备和谈成功后，他到南京政府任职时，夏天好有个避暑的地方。国民党蒋介石也一度为和谈成功而

预作打算，这就不得不考虑如何解决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明确提出的特务组织问题。

因为戴笠秉承蒋介石的意旨，不仅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一切威胁、影响国民党统治的政治力量实行特务手段，进行侦伺、密捕、监禁、暗杀等活动，而且对于国民党党内、政府内、军队内等统治体系内部，一切可能影响蒋介石个人独裁统治的人物和力量也进行监视和控制。因此在国民党内，也出现了取消特务组织的呼声。这便促使蒋介石要采取措施，解决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问题。

现有资料中能够见到的最早的关于军统局改组的说法可能出于戴笠的竞争对手李士珍。据1945年6月3日唐纵日记记载：“研究奉命审查宪政实施后运用合法体制办理特务工作方式，原案未署名，想系李士珍所提。原案建议由警察执行特务工作。”这说明，最晚从1945年6月起，蒋介石就开始考虑军统局改组问题，而改组的方式是把特务工作纳入到警察体系中去。

在这种情势下，戴笠的处境更加艰难。据江绍贞《戴笠和军统》考证：“蒋介石的宠将陈诚，很想将军统部分机构和人员接收过去，充实扩大他自己的特务系统。陈果夫、陈立夫等CC派首领，更是想趁机把军统搞垮，以扩大和加强中统的职权。其他如原力行社的一些头目邓文仪、康泽、贺衷寒等，也都想由自己来掌管军统，扩大个人的权势。这方面的情况，戴笠早有所料，他在1945年8月14日与黄天迈的谈话中就曾说：‘本局工作今后比抗战时期更为艰苦，委员长外，都将主张取消特务，也许改头换面委曲求全而不可得，如本局不存在，必成共产党的天下，岂止本局之不幸，实国家之不幸。’”

在大环境不妙的形势下，国民党内觊觎戴笠权势的各方面也不断向蒋介石进言，攻击戴笠。据唐纵1945年8月23日日记载：“委座手令戴副局长，不应令忠义救国军进入上海，围缴敌人枪械，严词斥责。”这肯定是在蒋介石面前说了戴笠的坏话而致。在这种情况下，戴笠深感处境艰难，准备以退为进。唐纵9月22日记载：“雨衣兄来访，言及美国陆海军在华将领魏德迈与梅乐斯之冲突情形，其后言及军统局本身前途问题。彼表示退让，要我与介民二人中择一继任。我当劝其不必作此考虑，现在局势尚是严重，不能轻易言退，且中国人落井下石，如果失势，更将遭人攻击！彼听闻此话，不觉泪流，此一伤心事也。”10月30日记载：“雨衣对于陈辞修（陈诚，字辞修）要取消别动军事，甚愤慨，愿与一搏。余劝其再忍耐。就其谈话，彼对于汉奸似已收得不少财产，进献政府，这是他战略之一。”

据文强回忆，1945年12月下旬，戴笠在北平提到此事时说：“世界上哪个朝代、哪个国家没有特务机关，人家越喊要取消便越显得重要。但是军统局这个名称有些臭了，组织也太庞大了，经费确也筹措不易，所以要化整为零，以合法化来堵人言可畏的口。凡事要为领袖分忧着想，我跟他30年，是深知此

道的。”他的想法是：“第一，准备改组后的国防部二厅谍参系统和对外使馆的武官系统，要合法化地全部控制起来，这个任务要介民先生去完成。第二，是将内政部警政司扩大为全国性的警察总署，是合法化安置人员最多的一条出路，然后才能全部控制警察方面的行政、人事、教育。对李士珍派，能容就容，不能容就去。第三，是与张嘉璈部长早已说定，要求在交通部成立一个交通警察总署来统驭全国铁路、公路的警务机构系统，并将本局的所有武装部队改编为交通警察部队。”

戴笠这个“以退为进”的策略实际上在此次谈话前就已经开始启动，其中一些想法已经得到蒋介石的同意。据1945年11月7日唐纵日记记载：“雨衣兄顷签报撤销交通巡察处，成立交通警察总局，奉批照办，交军政部拟具具体办法呈核。此雨衣兄在政治斗争上又一成功也。彼能了解委员长之心理与适合委员长之需要，故能逆转环境，转败为胜。”1946年1月19日唐纵日记记载：“雨衣兄约同龙文、人凤、其武、肖白与我，在其家商谈军统局之今后组织问题。昨日主席约他在黄山指示今后政府将要改组，各党派均将参加，军统局需要取消，要他自己研究一办法，他不负责，而他能实际控制这机关。大家商量在内政部成立警察署，他任内政部次长，由他保一署长，或在行政院成立警察总监部，他任副监。估计前案容易通过。他要我任署长，我不愿意，因我与他的作风配合不起来。决定请龙文执笔写报告与方案。”1946年1月30日日记中又记载：“最高情报会议于上午11时在主席官邸举行，到戴雨衣、叶秀峰、王芃生、张贞夫、龚愚等。主席指示：（一）各机关应积极对于政府机关腐化败坏纪纲之事情严加纠举；（二）党员监察网更应特别加强，社会一切动态，党内一切不良毛病，均须严予纠举；（三）对于共产党工作不深入，必须派人潜伏其内部工作，以入虎穴之精神建立内线；对于共产党之造谣惑众伎俩，各机关毫无办法，以致造成社会不安之现象，今后亦应讲求谣言攻势，谋略工作诚为重要也。”到1946年3月1日，交通警察总局正式成立，以戴笠推荐的吉章简为局长，解决了其特务武装的安排问题。而内政部此时也开始安排，由唐纵任内政部政务次长。政务次长是二把手，除了部长之外，就是政务次长最大，唐纵任此职也是蒋介石亲自决定的。

唐纵原是戴笠的部下，戴笠任特务处处长时，唐纵曾任帮办即助手，同时又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六组组长。蒋介石以唐纵为内政部次长，就是为了控制警察系统。后来内政部警察总署成立，也以唐纵兼署长。而国防部二厅是由原来的军事委员会二厅改组而成的，主管谍报参谋系统。国防部是戴笠死后才成立的，厅长是由郑介民以国防部次长兼任。这实际上还是按照戴笠的设想而实行的。可以说，戴笠的三个设想都实现了。

这里面唯一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戴笠自己究竟任何职。由于戴笠是蒋介石运用起来最得心应手的工具，无论怎么改组、调整，蒋介石还是要用戴笠主

持特务工作，所以蒋介石的意思是还是要由戴笠“实际控制”特务组织。这里还要说的是军统特务组织的原则是“秘密领导公开”，所谓“秘密”，就是指军统局的组织系统，所谓“公开”，就是指军统局所能控制的非军统局的系统。以上所说的谍报参谋系统也即二厅、交通警察系统、内政部警察总署系统，还有兵工署警卫稽查处、驻外武官系统等，都是由军统局控制的“公开”系统，都要服从“秘密”的军统局系统的指挥。各地的“公开”系统要服从同级军统局区、站、组的指挥。因此，改组后这些系统还是在戴笠的实际控制之下。迨戴笠飞机失事后，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先后以郑介民、毛人凤为局长，这些“公开”系统仍要服从“秘密”的系统即保密局的控制指挥。如果戴笠没有失事，这些系统还是要由戴笠来控制指挥的。

蒋介石为什么还要用戴笠掌控特务组织？这与当时的政治局势密切相关，也是戴笠在国民党蒋介石统治中所发挥的作用所决定的。

政治协商会议虽然达成了五项决议，但蒋介石并没有下定和平建国的决心，而是对政协会议的成果采取了敌对的态度。CC系领袖陈果夫甚至对蒋介石进言：“政治协商会议必无好结果。且无论如何，共党已得到好处，本党已受害……中国如行多党政治，照现在党、政、军均未健全之际，颇有陷覆辙之可能。请临崖勒马，另行途径。”中统局还以重庆传言的名义向蒋介石报送情报，告以“多数国军干部咸表愤慨”，中共“意在逐渐减消委座权力，以法共对戴高乐之手段对委座，是可忍孰不可忍”。蒋介石表面上虽对政协表示支持，但过后却称“政治协商会议集会的三个星期，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迨1946年3月1日到17日，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对政协会议大加挞伐。最后，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形成的决议全面推翻了政协会议的决议，并在东北问题上坚持战争道路，仍然想保持原有的法统和蒋介石的独裁地位，因此仍然坚持与中国共产党为敌的立场。早在政协会议闭幕之时，国民党就制造了沧白堂事件和较场口事件，使和平建国的前途布满了阴霾，蒋介石也已经做出了针对共产党的特务部署。

与共产党为敌，蒋介石是需要戴笠的。蒋介石是个权术大师，戴笠是他的得力工具。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为了对付共产党和社会上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力量，也为了对付国民党统治体系内部那些反对建立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力量，蒋介石曾经先后建立了以二陈控制、徐恩曾具体指挥的党方特务组织，以康泽为首的别动队，以邓文仪为首的南昌行营调查科。后来，经过不断分化整合，成为军统局和中统局两大特务系统。而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科归并到戴笠的系统，成为军方特务组织扩大的组成力量。康泽的别动队化于无形，但抗日战争时期，戴笠所控制的特务武装实际上起着别动队（其中一部分就以中美合作所别动军的名义存在了很长时间）的作用，并且已经远远超过了康泽别动队的能量。戴笠始终以效忠蒋介石为核心，以反共为职志，所以他所掌控的

寻找真实的戴笠

特务组织不断扩大，能量不断加强，在反共和维持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此蒋介石决心走向反共道路的时刻，正是需要戴笠发挥作用的时候。对这一点，戴笠和蒋介石都认识得很清楚。

1946年3月10日，戴笠在北平怀仁堂举行的总理纪念周上的讲话中，认真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军统局的处境和任务，针对军统局受到反对的情况，他认为：

虽然现在抗战成功了，然而内部仍是不能安定。建国的任务，千头万绪，其艰巨更加百倍于今日。当前的国际情势，需要中国独立，中国本身更需要建国，如果今天有主张抗战胜利，革命已经成功，要停止我们的革命工作，那就是不了解我们工作为国家为民族的真义，也即是不明白国家当前与未来的内外情势。最近中央二中全会，十几天来所表现的，未出我预料之外。表面看来，对象是中苏问题，物质问题。另一方面，有极少数人是对调查统计局的问题；但我相信也有大部分人在支持调查统计局的问题，以为调查统计局抗战有功，无可毁灭，看来是毁誉参半的。我今天明白告诉各同志，我们不怕外间以一时的不谅解言论，取消与否也无所谓。在重庆未出发前，（按系二中全会前）有人告诉我，说有人要取消调查统计局，叫我设法转圜，我便以一笑置之。每次全会都有人反对我们；……我不知道什么叫打倒，什么叫取消，只怕我们的同志不进步，官僚腐化；如果这样下去，人家不打倒自己也会倒的。所以我时刻所想的是如何对得起先烈，如何保持光荣历史，决没有想到别人如何打倒我。……本团体有不可磨灭的成绩，也有不可毁灭的基础。

所以，因为形势需要，蒋介石不管对特务组织怎么改组，都要由戴笠来实际控制。

蒋介石离不开戴笠。

许多说戴笠被谋杀的人都说到戴笠飞机失事前的行踪，想从这里面找出他被谋杀的蛛丝马迹。那么，戴笠死前到底都到了哪里？做了些什么？从中能找到他是被谋杀的痕迹吗？

关于戴笠死前的行踪，说法比较多。这里面涉及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戴笠最后一次到北平是哪一天？二是他在北平、天津、济南、青岛都干了什么？

文强在《日本投降后戴笠来平情况琐记》中写道：1月22日，时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主任的他在锦州接到马汉三转来戴笠的电报，让他当晚飞到北平，“有要事相商”。当晚7时，他在北平见到戴笠。而且戴笠在北平期间，曾负责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的安全工作，宋是2月1日到达北平，7日离平飞沪。文强的回忆还提到，戴笠在春节的第二天宴请了美国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1946年的春节是2月2日。接下去他就写了戴笠飞机失事前在北平、天津的活动。